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〇五期 ——
(二〇一三年八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308a)

【往事非烟】	北大“文革”与文革风云回忆反思——兼评蒯大富回忆	戈 辰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七)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非烟】

北大“文革”与文革风云回忆反思——兼评蒯大富回忆

• 戈 辰 •

在《西岳论坛》见到李亚平转贴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扉页上那几个名字，前边几个中学生红卫兵头目，他们的个人影响不是全国性的。令我感兴趣的是后面几个，最值得关注、最有史料价值的当然是蒯大富的回忆。（蒯大富：《潮起潮落》，见本刊 zk1102c，zk1102d——编者注）抽了大半天时间读完蒯大富。因为忙于与先秦史有关的事情，很想立即忘掉这事。可是几天来，脑子里老是萦绕着“批斗”和“武斗”的场景，以至无法摆脱开。

我算老几？我有什么资格讲？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又在我们学院教了几十年历史，对我院学生们讲几句该可以吧？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三年级，文革中我始终是普通群众。又因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和对政治不敏感说话又随便，差点被别人打成“反动学生”，这就逼着我在几十年间“苦其心志”，学马列、读毛著，关注中国现代史，反复思考文革动因及其是非成败。我想，蒯大富等虽然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所以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回忆文革的书，亚平等研究现代史的老师们可以进行全面搜集整理研究，而我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先秦史，对于文革，就只能据自己所见、所闻、所思谈一谈。

一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以1966年6月1号为标志。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号，《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时间全国、首先是北京高校炸开了锅，北大成了文革风暴漩涡的中心，北京市各单位组织群众来北大“参观学习”，接着是天津的学生，再后来是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校园内人山人海围看大字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聂元梓等的大字报是5月25号贴在大饭厅东墙上的。很快就有“老北大”指出1957年北大右派分子的大字报《是时候了》就贴在这个位置。聂元梓们的大字报又有？“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这样的话。有鉴于57年的教训，周围很快贴满了捍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可是6月1号一广播，风云突变，很快又贴满了支持聂元梓们的大字报。

聂元梓们何以有这样大的胆量和见识？蒯大富说：“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蒯大富这样说，说明他很可能至今不知道，聂元梓们的大字报可以说是毛老人家一手策划的。是康生在北大一次会上得意洋洋地透露的。（我当年收集的文革初期《中央首长讲话》，在南京大学读研时被孔乙己窃走，现在只能根据亲耳所听凭记忆写出大意：）康生说，五月底，当聂元梓们受到围攻焦虑不安的时候，他也感到很大压力。那天接到了主席的电话，说让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他一下子觉得自己解放了。康生说到这里，人们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

那么，聂元梓们的大字报跟康生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才知道，原来“中央”有一个神秘的“理论小组”住在北大，陆平们风闻其事不知其意欲何为。这个组的关键人物，被聂元梓们亲切称为“曹大姐”的，就是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聂元梓近年在努力撇清大字报与康生的关系，怎么撇得清呢！？

蒯大富说：“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这时候的蒯大富还是一个普通学生。过了几天，他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社论中嗅到了极左的气息，立即写了《也向校长质疑》，这时的他，以他极左的思想基础和看风使舵的本领来施展，开始不是一般的学生了。

极左思潮的根子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先是“一化三改造”、“反‘反冒进’”、“反右”，接着是“三面红旗”，几年之间，在毫无经济基础的情况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本是极其明显的错误，违背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违背了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光辉灿烂的雄文《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对于“‘左’倾空谈主义”的驳斥，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但由于最高领导人的固执，把一切冷静客观的意见都斥之为“右”并加以政治迫害。59年8月“庐山会议”，整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令曾经讲过要“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都惊出一身冷汗。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彭真等人也都流露过对毛的委婉批评，刘说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彭说出“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的话。这笔账迟早要算，但不那么容易。

毛要做一篇大文章，首先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一种毛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气氛。从62年到65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划批判历史学家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一切企图为彭德怀翻案而危及毛的威望的人。因为毛动用江青是以文艺为突破口的，所以叫“文化大革命”，其实完全是政治斗争（如《五·一六通知》所说：“一

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1965年批《海瑞罢官》，1966年3月批“三家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四个掌管要害部门而令毛不放心的人捆在一起，揪出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时还公布了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于是极左思潮蔓延到了所有对于政治敏感的热血青年中。

《五·一六通知》否定彭真起草的关于文化革命的《二月提纲》，理由是这个提纲“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试图将“文化革命”约束在学术批评范围之内。《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同学们若有兴趣不妨读一读。这是一篇足以令人疯狂的文章，也是一篇乱党、乱军、乱国的文章。文章由陈伯达口授，由刚从军队抽来的三位秀才撰写。

66年6、7月，点燃文革熊熊烈火的主席却不在北京，他把烫手山芋交给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自己躲在清凉的“西方山洞”，聆听着“神都”惊动世界的风雷。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调动新北京市委的精兵强将组成“工作组”进驻高校。“第一夫人”王光美，还希望像64年在“四清运动”中创造“桃园经验”一样，紧跟伟大领袖左的精神，再创造一个“清华经验”。

蒯大富欣逢其会，粉墨登场。在《也向校长质疑》之后，发现工作组“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写了《工作组往哪里去？》几天后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蒯大富的确非常聪明，他说：“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蒯大富也的确非常坚强，辩论、绝食、迎接批斗、笑对开除团籍，勇敢捍卫他所认定的“真理”，这令人欣赏！而这样一来毛所需要的火候就够了。

与此同时，北大也煽起了与张承先工作组的斗争。仔细想来，几张关键的大字报都是高干子弟带的头，可以相信，他们的消息来源是可以通往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6月18日突然发生的大规模揪斗“陆平黑帮”的事件，我相信是有人事先布置的。工作组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刘少奇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上批示，肯定了工作组制止学生批斗干部的做法，这就中了招数。

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号讲了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8月5号，做了四年的“大文章”点睛之笔出来了：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应该是8月6号的凌晨，这张大字报抄件贴在了北大大饭厅东墙上。听到消息，我翻身下床跑向大饭厅，挤到前面去看。看到最后几行，惊呆了，不敢相信是真的又不得不相信是真的。回宿舍路上，脑海里翻覆出现“62年的右倾和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因为6月1号晚上我们刚从农村“四清运动”前线被召回校，《四清工作手册》不少文件我都认真读过。62年、64年……，这不是指刘少奇又是谁呢？而且，“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把大字报贴到北大，（据说最初是贴在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谁抄出来？）似乎只有利用狂热的学生运动才能解决问题了！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大批天津来的学生住在北大，17号晚上在“五四运动场”集合，每个北大学生带二十个外地学生，连夜出发，步行到天安门。从沙滩、王府井南下走到东长安街已经挤得走不成队形，我甩开天津学生自己移动，快到文化宫，听到广播，毛主席上了天安门，这时是早上五点。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几十万聚集到广场上来的彻夜未眠的年轻人，完全忘记了饥饿和疲劳，这就叫做革命的激情或者说狂热。而此刻他们最大的愿望，是看到毛主席！

我移动到金水桥附近北大集合点，听说毛主席刚才来到我们中间，还让挑选一部分同学一起上了城楼。我抬头望那个熟悉的地方，令我震惊的是毛主席穿着绿军装，旁边还有一个人，谁？林彪！两个人，很突出，过去从未有过。周恩来、陈伯达、中央文革那些人等等在两边排开。

我到北京三年来，多事之秋，除国庆五一游行外，经常有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支援巴拿马、支援越南、支援刚果……）。北大清华的学生总是被安排在金水桥前，抬头便是主席台，领袖们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今天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刘少奇一个人站在后面第二排靠东边的地方，（文革中“靠边站”一词即源于此），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一个跟他说话。陈伯达（大概是会议主持人）、林彪、周恩来、聂元梓讲过话之后游行开始，人群从东长安街经天安门走到西长安街西单附近解散。过了一阵，毛主席离开了主席台，大概是接见城楼上的代表去了。满头白发的刘少奇孤零零站在那里十分显眼。广场上的群众不走了，齐声喊着：“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重复了百十遍，大概嗓子喊哑了，歇了一会儿，又开始喊。时间大约有半小时，毛主席又出现在城楼上。

第二天的报纸上，中央领导人排列顺序大变。报上又说红卫兵们不断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删去了“刘主席”三个字。这让我懂得了许多事情。而且，毛主席穿上了军装，又对给他带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意味深长啊！（此后中学生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打、砸、抢、抄、抓，危害全国，亦源于此。然在“文革”，中，“联动”之流所作所为不过是一个拙劣的小插曲。）

从“8.18”开始到十一月下旬，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上千万大、中学生“串”

到北京，接受主席的革命思想，同时开始了全国“大串联”，把“革命火种”撒遍全国。九月份，我只身南下“考察”，经武汉、长沙、韶山、桂林、南宁、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国庆节前回到北京。这时候，“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样的标语口号遍及全国。由于伟大统帅号令的巨大威力，各地“保皇派”基本上已经失势。我惊奇地发现，各地“造反派”革命群众几乎都又分裂成了两大派。

两大派，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形式呢？主席有没有预料到呢？我有必要深入了解。每到一地，在接待站掏出学生证登记住宿，往往就被人热情邀请，让介绍北大情况；只要表示对这派的支持，就有可能受到头头接见，希望你留下来当参谋，甚至许愿将来给你个“常委”之类。我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只要说一句“我的家庭成分不是红五类”，就可以走人了。造反派头头，令人有“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感觉；其中有曹孟德、刘玄德，有孙权、袁绍也有董卓。高校“造反派”中有些“勤务员”是很优秀的青年，真心诚意效忠于伟大领袖、献身于革命事业。“外州县”的“红卫兵”头头，往往就是吕布、马超，将来成为“红色政权”的“勤务员”应该就是他们的理想。

忽然袭来的“革命”风暴和轻易取得的权势调动起人们的贪欲，造反派头头和他们身边的诸葛亮意识到，“夺权”事涉上上下下政治经济权利的重新分配，所以，只有招兵买马壮大实力，才能在斗争中击败对手。我倾向于认为，开始造反时，头头们大多出于革命激情和对毛主席的热爱，其后分裂为两大派的原因就是私心和贪欲了。不过这也未必正确。后来逐渐知道，“勤务员”的背后往往有“黑高参”指挥，“群众运动”其实一开始就是群众的“被运动”。

1966年10月，北大东操场举行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大会。操场边的土台上，从南向北依次是彭、罗、陆、杨。罗因为跳楼自杀摔断了腿，只能扶着拐坐在地上，其他人站着，低着他们的“狗头”。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之后开始批判。其中一个发言人是聂元梓手下干将，原党委副书记、教务处长崔雄。他声色俱厉地质彭真：“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押送人员把彭真移到麦克风前。愤怒的口号声过后，传出彭真十分清晰不紧不慢的声音：“我不反对毛主席，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永远也不会反对毛主席。”崔书记傻了，立即领着大家喊口号。当时最流行的是陈伯达在一次会上喊出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崔喊：“彭真不投降”，大家跟着：“彭真不投降”，崔喊：“就叫他……”他犹豫了半秒，接着喊出两个字“交待！”操场上群众一时发呆，紧接着忍俊不禁，轰然大笑。据说崔原想通过这次批判跟陆平、彭真划清界限，大概良心发现，觉得彭真不至于该“灭亡”。后果呢，是他在被禁闭后自己灭亡了自己（跳进北大红湖自尽）。这个在57年主持北大“反右斗争”的大左派，此时左思右想左右为难只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

据说康生得知此事恼怒万分，质问为什么给彭真提供放毒的机会？于是有了11月初在工人体育场重新召开的“批斗彭罗陆杨”大会，这次是肯定要打下他们的嚣张气焰了。可是彭真的一句话和罗瑞卿大将坐在台边垂头丧气像个讨乞的残疾人，这一幕在我头脑中印象太深了！忽然，我因为自己有一些另外的想法噤若寒蝉。难道我真的中了毒？难道我真的是“反动学生”？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当时的处境，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我为什么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1965年5月，我班一同学在颐和园昆明湖游泳淹死。我希望班上开个追悼会，团支部书记拒绝，理由是这个同学的爷爷是资本家。我据理力争，不得要领。书记问我对班上工作还有什么意见，我搜肠刮肚推心置腹跟他在哲学楼旁聊了两小时。

1965年9月我们下乡参加“四清”。不久在工作组生活会上，组长开始抛出我的若干问题，如摔进路边水池是企图破坏工作组形象（我以为水深半尺其实深一米多），早上穿背心是想感冒生病回学校（我准备担水），手上拿一串葡萄在街上走是生活特殊化（工作组成员解放军老

胡买的，我从不吃零食，就一路拎着回到住处），对这些莫名其妙的无稽之谈我一一做了解释；后来就说我对地富反坏点头哈腰（我尚未弄清每个社员的家庭成分），在批斗会前忽然吟诗“相煎何太急”（我在组内研究批斗会时说曾经有一个管制分子在被批斗时吟此诗，接下来想说应如何驳斥却被组长制止），又说我曾在学习会上说“毛主席著作土里土气”。我的原话是：“原来在学校读马列著作多，觉得毛主席著作土气，现在下乡再读，才发现毛著水平很高。”现在忽然抛出这条就要我的命了！我说你不能断章取义，别人就说你在学校有那样想法也很严重，要做深刻检查。我检查了：个人主义、私心杂念、爱出风头，人家说只触及皮毛，没触及灵魂，意思是你灵魂深处思想反动。我说这样一来我喊“毛主席万岁”你们也会说我喊反动口号。人家问为什么？我张口结舌解释不清。这样一来，“说‘毛主席万岁’是反动口号”，就成了我的主要罪状。

文革初起，北京高校之间开始“串联”。因为“四清”时我们是与北京林学院老师组成工作组的，我们首先串到林学院。见到我们副组长，他抱歉地对我说：我们之所以那样对待你，是想把你开除。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鉴定材料里写着“对党团组织不满”——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工作队员呢？后来感觉你表现还过得去，就暂时不管了。

所谓“阶级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回校不久，6月中旬，在我们住的三十八斋楼梯墙上，世界史班的两位红人贴出一张大字报，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历数我在乡下的“反动言论”。（不知道他们从哪弄到的）这是把我往死里整啊！我连夜写大字报一一解说，那两三天时间，大腿上的肉急剧萎缩，走路都软得发抖。我的申辩刚贴出不久，处理“六一八事件”，又被人逼我撕掉。看来只好等待？“运动后期处理”了。

我实在不明白，我不就是给团支部书记提了意见嘛，而且是私下当面里提的，怎么就是“对党团组织不满”？顶多就是对你团支书个人不满吧！跟党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不是不满，提点意见，希望班集体更好。我连个团员都不是，（按：高中三年，59—62年，成天忙于与饥饿和疾病斗争，我们班只有一人入了团），一上大学就参加学校“美术社”、“体操队”、“游泳队”，有空就骑上自行车满北京转，鹫峰、潭柘寺、周口店都去过，买了月票天天去昆明湖游泳。说我是差生我承认，说我有“对党团组织不满”的思想，说实在的，还真是高抬我了。“四清”中和“文革”初挨了整，这样一来我真有了“思想”。我当时的思想就是：一定要把提意见和“反对”某个人区别开来，把某个人与党团组织区分开来。否则，我死路一条。

令我噤若寒蝉的思想就是：我想不通，不是说彭罗陆杨是“反党集团”吗？应该揭露他们如何结成集团，又是如何反党的。怎么只问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主席？就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材料看，这几个人所谓的“罪恶”就是反毛，并不反党。从59年庐山会议或62年七千人大会算起，其实也不是反对毛这个人，是在十分尊敬他的前提下批评他的错误。这几个人，二十年代在白色恐怖中入党，彭在白区出生入死，罗陆杨都由长征过来，或枪林弹雨，或激扬文字，或协助运筹，他们献身党的事业功劳卓著。要说这些人反对党，而且结成“集团”，实在莫名其妙。

记得66年除夕，“中央文革”成员在清华大学操场上向学生们拜年，姚文元发表演讲，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发起全面进攻，夺取被他们把持的一切权力的一年。学生们激动的欢呼声响彻夜空。

我脑海里浮现出众多“草头王”。把六亿人民交给他们，毛老人家就那么放心？

接着是“一月风暴”。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后来得知，北大聂元梓、孙蓬一率战斗队在沪推波助澜；据聂后来说，这一举动是毛指使其女秘密传达的“最高指示”），上海“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头目是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中央

文革小组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贺电，于是全国各省“造反派”纷纷起来夺权。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国务院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四帅三副”）忍无可忍，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发生了正面冲突。谭震林愤怒地说：“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他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在激动万分时他说：我一生三不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这话已经说绝了！这事被称为“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的出现是毛没有想到的。如林彪后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68年10月）上所说：“主席原定在67年的3、4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所谓“见眉目”就是各省大体响应夺权，成立新政权“革命委员会”。林彪讲话给“二月逆流”的定性又是“反党”：“‘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四帅三副”“大闹怀仁堂”，（后来四月又有“大闹京西宾馆”），不就是反对毛发动的“文革”吗？这些人怎么可能反党？盛怒之下的谭震林说出过头的话，实际上是针对“文革”、针对毛，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捍卫党，绝不能说是“反党”。

各地“革命委员会”迟迟建立不起来，就我个人的看法，与中央高层的所谓“逆流”没有关系。“四帅三副”的言论，用当时的话说可以说是“保皇派”，而地方上的“保皇派”在67年的春夏大体上都已经垮了。“革委会”迟迟建立不起来的真正原因是各地“造反派”几乎都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也是毛没有预料到的。在67年夏天，他多次呼吁两派“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在当时提出解决“两大派”的办法是“要斗私批修”。（《人民日报》把“斗私批修”提高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的高度）。可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学说”，社会“精英”和热血青年们纷纷奋起，都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对立面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两派都说自己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都最最最听他老人家的话。你要他们“斗私批修”，谁也不会承认自己出于私心！（不少人真的不是出于私心！）你不是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吗？你不是说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吗？况且，《炮打XXX》已经做出了榜样。你忽然要他们“大联合”，怎么联合？以谁为主实现联合？

因为“夺权”事涉上上下下政治经济权利的重新分配，实际上，几乎每个人出于各种目的都会以死相争。“两大派”要么一派吃掉另一派，要么在斗争中同归于尽。一场全国性的“武斗”在所难免。

1967年春夏，北京大学形成两大派。一派是拥护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其基本成员是各系文革领导小组及听他们话的学生。另一派是由思想比较活跃的各种“战斗队”联合而成，包括“井、红、飘、零、团”五个组织，就是“井冈山”、“东方红”、“红旗飘”、“0派”（以化学系63级“0363”学生首创的“北京公社”为核心）、“团派”（从“新北大公社”摆脱出来的“造反团”），总称“井冈山兵团”。据说“公社”拥有“社员”六七千人，“兵团”拥有“战士”五六千人。我所在的中国史班33人，两派各有十来个人比较“铁杆”的人员，各团结了五六个比较温和的人员。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是两派“革命群众”都不敢收容的、要等待运动后期处理的“XX分子”，人家写大字报都不

让我签名的。到67年夏天，两派都努力招兵买马，本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很多教师也都纷纷“入社”或者“上山”了，高音喇叭不时播放某某“入社”或者“上山”的“造反声明”，给对立面造成巨大压力。这时，机遇来了，两派都有人来表示可以收容我。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羡慕了一年的红袖套，成为“红旗飘”的一员。

井冈山人在砸工作组留给历史系“文革”“专案组”的“黑材料”时，撬開箱子，上面第一份材料就是我的，其中有别人揭发我的“反动言论”的大字报的照片，看样子是半夜用闪光灯拍的。得知这消息，我陷入深深的忧虑，觉得有必要跟“系文革”说清楚。我在系办公室找到当时的负责人吴维能，逐条解释了所谓“反动言论”的本意。吴维能是个好人，他耐心听完了我的申辩，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你说，我们是相信你说的，还是相信那些好学生的？”我怔住了，只弱弱地说了一句：“要相信事实。”

因为我加入了井冈山，同宿舍其他人都是公社的，开始我还愚蠢地想利用这条件建议两派同学坐下来谈谈，解除误会，很快发现别人以未来的康生、陈伯达自居，视我为“斩监候”，不屑于对话。于是，我和另一个因其父在59年挨过整（对“三面红旗”有微言）而不受待见的同学搬到西边一间空宿舍。不久，又搬进来几位因住研究生宿舍而要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研究生，他们是：唐兰的郝本性，苏秉琦的郭大顺，宿白的胡仁瑞。再往西边宿舍，是邓广铭的李裕民，因为抽烟厉害，一人占据一间，用课桌拼成一张大桌子，继续着做他的学问。通过他们我还熟悉了汪篪的研究生胡戟、邵循正的研究生赵春晨等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这时候，我才从一个混沌沌的差生接近了学术殿堂，知道什么叫“做学问”。而我的某些自以为最最革命的同学，正致力于把“反革命”的帽子加到别人的头上，用这样的方式，“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67年下半年，当全国各地两派武斗如火如荼的时候，北京高校“红卫兵”也形成了两大派，即所谓“天派”、“地派”。“天派”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北大“新北大公社”为主，还有清华蒯大富的“团派”；“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和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为主，北大井冈山兵团当然得到地派支持。到68年春，两派对立越来越尖锐。聂元梓指使其爪牙高云鹏担任“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组建武斗队，希望尽快摧垮井冈山。井冈山处境艰难。几个高校成千上万的地派学生到北大游行示威声援井冈山，3月25日，聂元梓把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搬来，劝退了游行队伍。事后，聂元梓称此为“3.25大武斗”，把自己封为“制止武斗”的功臣。

3月29日凌晨，做了充分准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住在31斋的井冈山兵团“零派”“03纵队”的学生发起突然袭击，逐层、逐屋地驱赶殴打井冈山派学生，占领了31斋。这是北大长达四个月武斗的开始。

蒯大富说：“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

蒯大富不知道，北大井冈山人被赶出31斋后，首先是后勤部门支持井冈山的青年工人“海燕”战斗队武装起来，保卫井冈山，占领了兵团总部所在的28斋。公社扬言要把井冈山摧垮，逐楼驱逐井冈山人。一时间，海淀路上、32路车上尽是拎着大包小包落荒而逃的井冈山人。有亲友的投奔亲友，没有亲友的投奔“战友”——住到地质学院的教室里。我当时不在北京，在北大的表姐、姐夫到我宿舍搬走被褥和两个箱子，剩下一箱书太重，准备第二天搬，没想到当天夜里公社就占领了38斋。武斗结束后有同学告诉我，在某老师家的书架上见到我买的小说（多人曾传看过），我也在楼道尽头废纸堆检出我的三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没人要）。可惜我的几种线装书一册无存。跟武斗结束后回校看到床上空无一物而精神失常的同学相比，

我就算幸运了。有一位公社“勇士”在颐和园昆明湖游泳，被一位上海同学认出他穿的是自己的游泳裤，揪住不放，后来在“勇士”的箱子里搜出多床被面，多件衣物及照相机、手表等等。

当年北大南校门、西南校门以北一带的学生宿舍16号到44号计二十九座楼，井冈山人经过几次血战，保住了28、30、32、35、36、37六座楼。聂元梓把“井冈山兵团”赶出校园彻底摧垮的阴谋未能得逞。公社封锁了学校所有大门，进出严查，发现井冈山人就抓就打。无线电系62级的殷文杰据说是个“马丁·路德·金”，属于井冈山中最温和的成员，路过公社武斗总部44楼前，被武斗队员认出，上来就打，刺伤股动脉，血流不止而死。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在海淀街上被“公社”抓进楼里，毒打至死。近日见到《聂元梓口述自传》，她竟然这样说：“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不是在武斗中打死的，而是在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因此这件事不应该算在新北大公社打武斗的账上。”这个“老佛爷”，多么无耻！

37斋靠海淀路，井冈山在围墙开了一个门，成为向外的唯一通道。楼与楼之间用学生宿舍的双层床竖着排列起来，形成封闭走廊，防止周围楼上巨型弹弓发射砖头的袭击，保护楼间行人往来。就这么几百人，被“公社”数千人围困封锁，井冈山危在旦夕。

蒯大富误以为北大井冈山被打垮了，他说：“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这位大领袖如意算盘敲得很清脆。清华武斗是1968年4月23号开始的。三个月以后，他后悔了：“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其实，他四十年后也未必完全明白，他在老人家棋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让我们再回到68年春夏的北大。我在大约6月初“窜”回北京，不敢回校，经人指点来到了地质学院，先随便找一间空教室过夜。第二天早晨，被一阵叫骂声惊醒，说的不许占用这教室，边说边把我的包袱往外扔。我嫌他态度不好，想辩解，不料他开始肢体接触。幸好又来了几个学生，于是把我押解到“总部”办公室审问。我掏出学生证，说明自己无法回校。旁边一个学生哈哈一笑，指着我说：“‘新北大公社’的吧！”旁边人跟着哈哈。是啊，井冈山的怎么会不跟战友们住在一起呢？“……”我本想说我是山上的，可是想到自己被人打骂奚落，很给山上人丢脸，不妨让他们认定像我这种窝囊废可怜虫就是新北大公社的社员吧。

很快找到井冈山的“难民营”住下来。不几天得到通知，有个重要会议。会上，一个头头讲话：“希望多一些人能够回校守楼。站住脚就是胜利！如果被对立面摧垮，运动后期定为反动组织，一个一个地收拾，谁都没有好下场！”“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依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你被打垮了，就没有你讲道理的余地了。”我毫不犹豫：回校守楼！

话说北大学生宿舍楼原本叫“斋”，这时候再叫“斋”，咋听也别扭了，以下我就统称“楼”。37楼南面中间，井冈山人截开围墙，用床板搭成宽高约四米的甬道，通到马路边。37楼东西两边的34楼和40楼被公社占领，楼上架着弹弓，见着37楼进出的人就打。路对面是32路公交车车站，站上经常有不少等车的市民。经指点，我先混在人群中，马路上没车时迅速穿过马路即进入甬道，初次来，掏出通行证进入楼内。我被带领到一间宿舍，见地下有一大洞，扶梯而下约三米深有地道向北，在36楼上来，再下地道，经35楼再下地道到达了30楼。有了双层床连成的甬道为什么还要挖地道？因为两边都是公社的楼，为了安全更为了秘密来往。

30楼的4层走廊东头窗口，正对工字形的28楼南端西头4层窗户，其间距离约十米，

井冈山人在这架了一座桥，听说是数学力学系同学设计的。架桥的过程，先是在28楼南头东西向走廊内做好梁架，把绳索从空中扔过来，东边推，西边拉，千斤重的桥梁稳稳地架在了两楼之间十多米高的空中。我不得不佩服理工科的同学。深挖洞、高架桥，使井冈山的六座楼连成一体。我就住在30楼四层东头朝南的房间，也就是说住在桥头。

两派的高音喇叭没日没夜地对骂，其中经常播放的两首歌令我震撼。

一首是公社广播的，公社给“敬爱的江青同志”的一段讲话谱了曲，由公社合唱团演唱：

北大井冈山，好不好！（合喊：不好！不好！）
红旗飘里准有坏人！（重复两遍）
你们不斗刘邓陶，不斗陆平彭佩云，
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重复三遍）

最后一句一遍比一遍调子高，我仿佛看见那个妇人张着獠牙大口要把我吃掉。她这段话令我不寒而栗的就是第二句：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她对于北大的了解主要来自李讷。李讷回北大，要么找聂元梓口授“最高指示”，要么找历史系了解情况。历史系学生加入“红旗飘”的，主要是我们班的十来个人，我想，其中值得被老人家的夫人称为“坏人”的，那就只有说喊老人家“万岁”是“喊反动口号”的人啦！

（注：近日看到一个材料，说“聂元梓们整理了“红旗飘”中一些人议论江青的黑材料，并将之上报江青，以图借此摧垮反聂力量。江青闻讯后，勃然大怒，便扬言道：‘红旗飘里准有坏人！’”果真如此，那“坏人”就不止我一个了。其实我这个“差生”或者“坏人”，真还没有那么高的见识，对江青没有甚么认识，只是在文革初批斗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时听了她的发言，感觉到一丝隐忧——糟糕！伟大领袖的老婆就这水平？

（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等人到北大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参加了大会。李雪峰、吴德等得到消息后也急忙赶来。江青发言，可参看张承先《“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但张的回忆不准确，江说“把阶级斗争搞到主席家里来了”不是指张承先，是指韶华。江说不承认韶华是儿媳妇，说韶华她妈在延安是女流氓，说张承先不该重用韶华……。当时韶华就坐在中文系学生中，当下站起来就离开了。）

其后，有一个同学因为在宿舍大谈苏姐已、褒姒祸国殃民，被公社知道了要抓他，只好躲在山上楼里。还有一个同学武斗结束后因在纸上写出“绞死JQ、油炸JQ”被人告发，吃尽苦头，此是后话。）

另一首歌是井冈山广播的，是老人家四十年前（1928）的一首词《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这雄壮浑厚的男中音令我豪情满怀，誓与井冈山共存亡。

守楼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防止公社武斗队偷袭。戴上藤帽，穿上棉袄，上到楼顶，检查一下高音喇叭，看看公社有什么动静。

守楼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吃饭。学生食堂被公社控制，到那吃饭一旦被认出就惨了。海淀镇上有饭馆，天天去吃吃不起，还有被公社绑架的危险，只好自己在楼里做饭。我很快发现了自己的用处：上街买菜。第一，除了本年级同学，很少有人认识我，即便认识，也不知我上了山。第二，我成天锻炼身体，能负重。这里讲一个笑话：文革初有一次在五四运动场开大会批判翦伯赞，大会快开始我才去。历史系坐在最前边，我挤到前边正要坐，来了一位戴着红袖套的“纠察”，揪住我往后面赶。我说我是历史系的。他问：“你是哪个学校历史系的？”我说：“就是这个学校。”他把我上下打量一圈，说：“你还是到后面去吧。”又开始推。这时三年级考古班的班主任张新生站起来对他说：“他是我们系三年级同学。”几十年后在陕师大见到这位同学，他还是不认识我，一笑。至于我能负重，只说一句：参加学校业余举重比赛，我体重不到60公斤，挺举举起70公斤，得了第六名。

买菜在海淀菜市场。带着麻袋，跟着历史系井冈山的女管家到了市场，卖菜的认识女管家，价钱不用问肯定最低，很快帮我们装满麻袋，催我们回。事后得知，海淀镇居民大多支持井冈山，镇“革委会”好像也属“地派”。我想起了《毛选》里的文章《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时读毛著，真有体会啊！假设海淀居民配合聂元梓挤兑井冈山，这几座楼能守住吗？

北大武斗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它是原始冷兵器 and 现代科学技术的奇妙结合。

应该是在7月中旬，公社准备在半夜偷袭，捣毁井冈山大门甬道，堵死井冈山人的出入口。我们戴上藤帽穿上棉袄集中到37楼，到了后半夜，第一梯队在前边打起来了，同时37楼的探照灯唰的一下把楼前面照得通明，楼上的弹弓发射出密集的半截砖头。拿着消防斧砍向甬道的歹徒和拿着梭镖长矛的护卫队大惊失色狼狈逃窜。得到消息，我们立即脱掉已经热出一身大汗的棉袄，遗憾没有参与战斗。

第二天，哲学系四年级F同学送我几个水蜜桃，说是总部的慰劳品。他指指自己的嘴，肿得像个桃，说“这里挨了一下，吃不成。”

事后公社总结失败教训：一是井冈山人事先得到消息，说明公社潜伏有内奸；二是探照灯太厉害，是造成夜袭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们的决策是：一、清查内奸，二、掐断通向井冈山的所有电源。

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决策同时传到了井冈山总部。

我们后来才知道，由于全校电讯系统都由公社把持，井冈山和外界的通讯全被切断，所以公社仍使用原来的电话通讯系统。井冈山人从28楼地下挖了一条地道通往29楼东头地下的电话电缆接头处，然后连接窃听电缆，每天24小时专人值班监听记录有关通话。

“校文革”在对井冈山控制的几座楼断水之后，又要断电。没有电，不能照明，做饭麻烦，广播也哑了，问题大了！总部决定从海淀路马路边电线杆上的高压线上直接接电，地院战友立即送来了变压器。电线杆在甬道口东边大约三四米处，迅速爬上去不难，难的是上万伏高压电，必须带电作业，稍有疏忽便会被电击毙或摔死。北大物理系、无线电系懂带电作业的人不少，但在晚上、在武斗战场、在没有先进器材的情况下还要迅速完成接线，危险可想而知。

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7月22日晚上正式接电。这次是由理科同学担当短兵相接的战斗，戴上藤帽，穿上棉袄或用剖开的消防水龙带制成的“铠甲”，手执用自来水管道的制成的梭镖长矛，

集中到37楼一层待命。文科同学分别到各个窗口担当弹弓手，我被分配到略靠西边四层一个窗口，居高临下，可俯视从北大西南门出来前来进攻的公社武斗队。弹药很充分，是从非承重墙上拆下捣成两半的砖头，堆在顺手的地方。弹弓用汽车轮胎切成条，编成辫子，两头牢牢固定在窗框上。

担任接电的是无线电系的一位同学，据说还有两个预备队员，都给家人留下了遗书。我因在西边阻击公社武斗队，无暇东顾看他们如何爬上电杆接线。半夜，海淀路上已无行人，井冈山战士迅速搬出双层床建起东西两道街垒阻挡两边的公社武斗队。接电勇士迅速爬杆。公社武斗队从东西两面涌过来。西边的前锋握一杆大概是用跳高撑杆做成的长枪，左右两员猛将持约两米多的长矛，后面跟进数以百计的戈矛手，头戴钢盔，身穿黄棉袄，呼啸着冲上来。这时候，每个窗口都飞出砖头。由于公社喽罗兵太密集，我们可谓“弹无虚发”。到底是学生兵，一挨了砖头就往下撤，旁边两人立即拖着枪或者扔了枪驾着伤者撤。可以说，这半截砖头就打退了三个喽罗兵。然而，前锋猛将却是勇敢向前，逼近了床板做成的街垒，令人紧张万分！这时候，奇迹发生了，前锋猛将忽然像喝醉了酒，站立不稳，床板后面井冈山的长矛同时扎了过来，吓得三人连滚带爬往后撤。这一下，公社士气大挫。战斗进入相持阶段。

这是怎么回事？楼上的我看得莫名其妙。事后才知道，建筑床板街垒的同时，井冈山人在前边路面撒了两三米宽一层绿豆。古代“撒豆成兵”的魔法，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最高学府”，曾经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新北大”成为现实。

隔着马路，我所在窗口的正对面是“长征食堂”。公社人搬来几块门板，在食堂东边墙下构筑了一个最前沿临时工事。那里距我窗口约有六七十米，弹弓有点够不着。正巧这时指挥官给我派来一个助手，看样子年龄较大，又比较瘦弱，记得好像是理科的一名研究生，因为强烈要求参战，指挥官就让他来给我递砖头。看到砖头够不着对面，他说我们俩一起拉。于是他抱住我的腰，四条腿一齐用劲，这下飞到了对面墙上。我们就这样越打越准。工事里原有两个人，后来又跑过来一人躲了进去。几分钟后忽见那人戴了头盔跑出来，跑了不到5米，噔的一下直直倒下。工事里冲出一人，架起那人向西跑去。37楼上发出一阵欢呼。我和研究生却呆住了，他嗫嚅着：“是我们刚才打的……”刚才那一下力量正好，砖头准准地飞进工事。我不敢说话，摇头示意他不要讲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呢！

就在这时，灯忽然亮了，井冈山六座楼一片辉煌，欢呼声响彻夜空，接电成功了！井冈山的广播也响起来了：

……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我心中惴惴不安，似乎自己成了杀人凶手。第二天就听说，公社头头卢平（姓名与校长陆平音同）到前线督战，挨了一砖头，住进了医院，没有生命危险。我心想，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呢？

聂元梓们不甘失败，听说是吸取了教训，决定焊制“坦克”，生产“燃烧弹”，进一步升级武斗，不踏平井冈山誓不罢休。

就在这一天，中央发布了制止武斗的《7.24布告》，接连几天，大批工人和市民有组织地围绕着北大游行，高喊口号。27号，游行队伍进入校园，“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命令两派头头前去开会。28日凌晨，除了张春桥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

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汪东兴，中央的全体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首都高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我一看这阵势，井冈山守楼已经成功，下一步就是讨价还价，实现“大联合”了，于是收拾行装，回家“逍遥”去了。

9月20号左右，收到同班 WTY 同学来信，让国庆前务必返校，否则将取消学籍。

回校第二天，就遇到一件令我哭笑不得的事：我从38斋西北边那个门进去，有些内急，连忙窜进厕所尿尿。正有解放的感觉，忽听见一个女人大叫：“你是什么人？”我想这是男厕所，女人不会是问我吧？没有回头，继续解放。就觉得被人往下拉。转头一看是个泼辣的中年妇女，揪住我拉到工宣队办公室。那时人的“阶级斗争觉悟”超高！认为我要么是对工宣队进校不满，要么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毒害的小流氓。我解释说不知道那改成女厕所了，人家说改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会不知道？我说我离开38斋半年多了，昨天刚回校。工宣队电话确认之后，还教训我：以后小心点！

紧接着我班同学小Y就告诫我：千万小心，少说话，开会的时候，你一句话也不能说！又告诉我，井冈山总部给每个守楼的同学送一本小红书（似乎是《毛主席诗词》）作为纪念，公社的人不知道你参加守楼，上报守楼者名单时也没有写你，为了安全，这书就不给你了。我表示同意。

国庆一过，“大联合学习班”又开始了。上午8—12点，下午2—6点全年级同学坐在一起，工宣队主持，鼓励大家发言。一坐一上午，一坐一天，没有人发言。据说这样的情况已经多日了。我真有点憋不住，想说几句。小Y似乎感觉到了，又来叮咛我：“千万不能说话！不论你讲什么，都会被人抓住批判。害了你自已，也害了井冈山！”我因为有“四清”时的教训，也就听他的，坐在角落里，双手支在凳子上，偷偷练腹肌，练肱三头肌。

终于有人憋不住了。在我们年级参会的系办公室主任吴维能说：“那么，我来说几句……”他讲了些啥我记不清了，无非是紧跟工宣队的意思：两派群众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讲完了，依然是长久的沉默，他又憋不住了，又说点具体的事情，说这事是公社的不对啊，又说点另一件事，说这是井冈山的不妥啊……。就这样差不多坐了一个月。我的印象中，也就是吴维能发了那么几次言。

1968年11月3日这天，得到通知去第二教学楼开全系大会。大概是上面催得紧，工宣队急于要找突破点——揪出坏人，教育群众，实现两派“大联合”。会议开始不久，就听见有人高喊：“把反革命分子吴维能揪出来！”吴维能还没有反应过来，难道是喊我？是的，是他所认定的“好学生”们挥动拳头跟着喊起来。吴维能确认了是喊自己，就站起来走到讲台旁。接下来是几位好学生发言，揭露他如何在两派之间“跳来跳去”，“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还翻老底，说他过去还有过什么反动言论。批判会结束，当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人们鱼贯走出会场。我出去比较迟，吴维能刚好就走在旁边。他用无助又可怜的眼神看了看我。我很想递去同情和理解的眼神，但是我不敢，周围都是人，说不定正有人盯着我看我的态度呢！我回了吴维能一个毫无表情眼神。也许在吴维能看来，我就是幸灾乐祸。

第二天早上，人们在圆明园的小湖里发现了吴维能的尸体，据说在投湖自尽前，他还像汪篋一样喝下了“敌敌畏”。好学生们忙起来，刷大标语，写大字报，揭露反革命分子吴维能的反动言论（好像是说“人民公社不幸福”之类）和可耻的历史（曾几次自杀未遂的“前科”），分析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性。

我心想，要不是小Y的警告，有众多“言论”和最后必然“自绝”的，可能就是。我。工宣

队煞费苦心寻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其实若要追根溯源，“始作俑者”就是《五一六通知》和《炮打司令部》的作者。你要群众“大联合”，除非宣布那些都是错的。

即使这样也难。人和人之间伤了感情，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犹如一件官窑古瓷，曾经那么美好，一旦碰出裂纹，那就永远不能复原了。事实也是这样，北大文革两派，四十年后见面，依然无话可说。

毛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立即找到了解决学校“两大派”难题的办法：“斗、批、走”、“斗、批、散”。很快地，我们都被宣布立即毕业分配工作。不久，老人家又发出“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就把所有“革命激情”引向了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了。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知道，个别人不论是为了对革命负责，还是为了在工宣队面前留下好印象，都不会放过我。我要做最后一次挣扎，于是专门找工宣队谈话，把一年前对吴维能说的话复述一遍。听完我的话，那位年轻的工人帅哥没有任何表情，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上午年级开会，帅哥说：“快毕业了。有的人，我们本想帮他擦掉屁股上的屎，他却想往自己脸上贴金。”我想只有我明白他在说谁，我完了！

几天以后，托运了行李，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开了北京，1968年底，我来到陕西乾县羊毛湾水库工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后又转到华阴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一年半之后，1970年春天，正式分配工作。我自我放逐，到了陕北穷乡僻壤深山老林中，心存一丝幻想：有朝一日，“天子驾崩，大赦天下”。

十多年后在南京遇到当年同班同学老W，他告诉我，在我们毕业分配之后，人走完了，他最后走。工宣组组长郝师傅对他说，对立面有两个同学找工宣队谈话，说我们班有两个同学应该定为反动学生，一个是说“毛主席万岁是反动口号”的，另一个是企图为彭德怀翻案的，就是他。郝师傅说：“我们经过分析认为，你们两个的家庭出身都不是‘地、富、反、坏、右’，虽然生在旧社会，但是长在红旗下，怎么可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于是，他们把公社整的黑材料烧了。

我心想：难怪，我自从到水库工地以后就成了“好学生”了。可是，心里d了十多年的黑锅啊！

□ 原载《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七）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0 7 c 第六章 在高压下抗争的“4 1 4 串联会”（1 9 6 7 . 4 — 1 9 6 7 . 5）}

第十二节 不伦不类的“井冈山 4 1 4”，这个名称是我坚持的

在策划分裂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情，最后采纳了我的提议。

一是新组织的名称。

“东方红战团”认为，既然与“井冈山”彻底决裂了，那么在名称上也应当抛弃“井冈山”这块牌子，与“井冈山”划清界线。他们提议新成立的组织名称叫“东方红”。他们甚至搬出驻在清华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70的话：“我看甩掉井冈山的牌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既不同意张广友的观点，对他居然说出这样不合记者身份的话更感到十分吃惊。沈如槐与张广友交往甚密，视他为“良师益友”。我除了因解散“二万五千里”找过他以外，此后再也没有与他交往。这可能与他对“三纵队”——“东方红战团”的观点更欣赏，对“天安门纵队”——“三七战团”不太感兴趣很有关系吧？我认为他是伸向“东方红战团”的一只手。究竟是红手还是黑手，我不知底细，但我不喜欢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插手清华运动。我心里一直对他保持着一份警觉。

“东方红战团”与“井冈山”既没有什么渊源，也没有什么感情。他们对“东方红”这一称谓情有独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三七战团”不同。“三七战团”成员中既有来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派）的，也有来自“井冈山红卫兵”（蒯派）的。如“第一湘江”绝大部分组员都是最早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蒯派。所以，总体而言，“三七战团”对“井冈山”是有感情的。即使现在不得不要离开“井冈山”了，对“井冈山”这一称谓还是有一份依依不舍的情感。在“三七战团”的会议上，即使愿意分裂的人都不愿意易帜成“东方红”。如果易帜，不仅组织上离开了“井冈山”，还有一种投奔到“东方红战团”门下，被“东方红战团”收编的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是，这样的小心思又摊不到桌面上来。

最后，大家想出了一条非常充分的理由，那就是在414的基本群众中，大多数人对“井冈山”是有感情的。要让他们在组织上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决裂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再要他们在情感上与“井冈山”一刀两断，接受一个并不怎么喜欢的“东方红”，难度就更大了。新组织的名称固然很重要，但是争取更多的414群众跟着新组织走，那是更重要的，因为这与414独立后的前途命运密切攸关。

“三七战团”的人一定要我坚持在名称中必须有“井冈山”，并把这作为“三七战团”跟着“东方红战团”一起独立的条件。

在有关名称的协商过程中，无论是“东方红战团”还是“三七战团”，都认为在名称中应该有“414”，这点很快就达成共识了。我们不同意叫“东方红414”，“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们对“井冈山414”这个名称也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所以，在名称问题上争辩得很激烈。我绝不后退的坚决态度，以及我为414前途和利益着想的正当理由最终说服了“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们。经过反复比较这两个名称的利弊，最后沈如槐拍板决定，名称就用“井冈山兵团414总部”。这是我坚持的结果，也是“东方红战团”为了大局照顾“三七战团”情绪作出的让步。

所谓利弊，这里的“利”，也有沈如槐所说的“从‘井冈山’拉出去一支队伍，对老蒯影响可能不大，而在‘井冈山’内部‘另立中央’，会使老蒯十分难堪”这样的派利考虑。老实说，“东方红战团”的人会这样想，“三七战团”的人并没有那么去想。

名称定下来以后，有一位“东方红战团”的头头说，蒯大富已经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才是真正的井冈山人！我听了这种虽说不是全无道理的强辩，心里着实感到有点好笑。我想，只要你们接受了我的提议，我就不吭声了。

沈如槐后来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的名称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它带来的好处却妙不可言。”

要说“不伦不类”，其实是有先例可循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裂成“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也是共用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名称的。414与团派共用“井冈山兵团”，并非首创。不过当时我说服大家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用这一先例作为理由。

真正“妙不可言”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了414群众脱离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总部”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情感障碍。其次，让社会对414的认可也有一点帮助。因为从名称看，这是同一个造反组织的两派因观点不同而分家，并非是保守派为与造反派的对立而另起炉灶。

如果再说一点小秘密，那就是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点细微的奢望。我要“下山”了，要与老蒯分手了，这是非常伤感情的。这伤筋断骨的裂痕，是很难愈合的。但愿在名称上还连着这么一层脆弱的皮，希望能在以后的大联合中对创伤的愈合多少起点作用，也希望日后老蒯和老团们能明白我的一点良苦用心。

我不知道团派和蒯大富听到“井冈山兵团414总部”这个名称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可能很恼怒？可能很无奈？我现在知道大多数团派都认为这是414要沾响当当的“井冈山”的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想充分利用“井冈山”的品牌效应和无形资产。这样的猜测是不符合实情的。“东方红战团”根本就不想沾“井冈山”的光，他们在心理上对“井冈山”是排斥的。我代表“三七战团”坚持用这这个名称，并非想沾“井冈山”的光，而是出于对“井冈山”还留有一份真诚的情谊。团派的朋友们可曾想到这一层？

第十三节 尽倾主力背水一战，这个建议是我提议的

我参与的另一项决策是策略性的。

沈如槐原先的设想是这样的：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在“东方红战团”中精选五十名骨干分子结成死党，由沈如槐亲率这精锐之师组成“敢死队”，抱定必死的决心，成立414总部。以“三七战团”和“东方红战团”剩余力量为主包括绝大多数414群众由我牵头仍然留在“414串联会”里，以照顾414群众中不愿分裂的情绪。如果“敢死队”突围成功，那么“414串联会”马上就跟进，合并到414总部里去。如果中央对刚成立的414总部狠狠地打一闷棍，定性为分裂势力或反动组织，那么这批“敢死队员”即使做拼死的抵抗，也肯定要“光荣牺牲”了（被狠整的意思），414肯定要遭受一次严重的挫折，但是“414串联会”这块阵地还在，仍然可以继续与蒯大富的兵团总部和新成立的革委会周旋到底。

这确实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两全之策。沈如槐的身先士卒，“东方红战团”的勇挑重担，都让我深受感动。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士气高昂，誓言为信仰、为主义、为正义而甘愿献身。那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情，令人动容，令我钦佩！

当沈如槐在26（或27）日向我通报这一方案的时候，我是同意并接受的。回到“三七战团”，我找汲鹏等人商量讨论这一行动方案。大家认为这一方案的最大的优点是稳妥，最大的弊病恰恰也是因为稳妥。把退路考虑得过于周到的稳妥方案会给广大414群众留下头头们顾虑重重、决心不大、信心不足的印象。这样瞻前顾后反倒更加重414群众的疑虑不决，有可能让这样一次生死决战最终因不够大胆果断而流于失败。所以大家认为这实质上是一个稳而不



妥的方案。我们经过慎重讨论反复比较，最后形成了另一个方案。

我把“三七战团”的方案通报给沈如槐：既然这是一次决定414命运，也是关乎清华运动方向的大决战，那么414的决策层就应该有背水一战的勇气和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建议414勤务站的大多数头头都拉出来参加414总部，只留下很少几个头头留在“414串联会”里，对顾虑较多，想看看形势发展再说的那部分414群众起一个“收容队”的作用。那样，414总部宣告独立的浩大声势，上面即使要打棍子也多少会有一点顾忌。而414的基本群众看到414头头们都义无反顾地脱离了总部，他们受这股声势的鼓舞，也会大胆的跟进，因而414突围成功的希望反而更大。两强相遇勇者胜！在这样的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应该多显示一份勇气，少留存一点后路。

这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冒险计划，更有风险性，当然也更刺激。对于我们这些二十几岁血气方刚、派性充斥的年轻人来说，诱惑力也更大。

“三七战团”向来是以观点温和、行动稳健著称的。当我提出这样一个激进的、冒险的方案，实在有点出乎于“东方红战团”的意料。在他们的印象中，“三七战团”观点温和，行动犹豫。现在他们认识到了“三七战团”观点虽然温和，立场却很坚定，而行动是坚决果断的。看到“三七战团”有这样的决心愿意与“东方红战团”一起共赴艰难，令“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们既惊喜又感动。

经过仔细的反复推敲，最后由沈如槐拍板决定：“414串联会”的核心中，除了宿长忠、蒋南峰、王良生三人留守以外，沈如槐、孙怒涛、刘万章、陈楚三、汲鹏、张雪梅、陈家国等核心悉数参加414总部。414的两大主力部队“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倾巢而出，不留预备队。

414已经不打算只用一小股“敢死队”做“火力侦察”，而是要用“主力军团”做“集团冲锋”。那气势，正如414战歌所唱的：“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我们挺胸昂头，有进无退，勇往直前！

#### 第十四节 突围成功，414终于独立

414这边为独立紧锣密鼓地策划于密室，兵团总部那边为成立革委会大张旗鼓地筹备着盛大典礼。

对于兵团总部召集的总部会议，我一贯的态度是叫我参加我就参加，没叫我参加我也不会主动去问。《四项协议》签订以后，兵团总部就不再通知我参加总部会议了。对此，我十分理解，因为我已经完全站到了总部的对立面。再参加总部会议，既不适宜，彼此也会很尴尬的。

我不知道总部筹办革委会庆典的情况和进展，但是5月30日是一个已经铁定的大庆日子。兵团总部上上下下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高音大喇叭制造着喜庆的气氛。大礼堂区、东西干道、主楼广场彩旗飘飘。从全国各地邀请来的造反派代表也陆续到校。已经有过4月10日在中央主楼广场承办三十万人揪斗王光美大型集会的经验，再办这样一场庆典，驾轻就熟，小菜一碟了。

414总部的成立日期定在5月29日。这个日子也是精心计算过的。无论如何一定要赶在5月30日革委会成立之前成立414总部。革委会成立之前成立414总部，那是一个红

卫兵组织内部闹分裂的问题。要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再成立4 1 4总部，那就是公然与新生的革命政权对抗，性质要严重多了。

在沈如槐的统一指挥协调下，4 1 4广播台、4 1 4报、各主要战斗团体准备了大量的文告、大字报和大会发言稿。这过程中，“东方红战团”的战斗力得到充分的展示，“三七战团”也紧密配合，互壮声威。

5月28日的夜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零点过后半小时，随着“东方红”浑厚激昂的开始曲，4 1 4广播台的声音响彻清华夜空。音色声调酷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女播音员隆重广播了由我参与起草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 1 4总部”成立宣言》，宣告了与“井冈山兵团”并行的、相对立的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诞生。然后宣读的是《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校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书》以及4 1 4总部的几个决议、“4 1 4串联会”的决议、“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的《严重声明》等。那个晚上，还没有入睡或者睡后又吵醒的人们都知道了清华园终于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事件：4 1 4正式分裂出来了，而且声势不小！

5月29日上午，在大礼堂召开的4 1 4总部成立庆祝大会更把气氛推向高潮。二千多人的大礼堂里席无虚座。过道上、空闲处也都是坐的、站的人，甚至在主席台上的讲台周围也全都坐满了人。发言者慷慨激昂表着忠心和决心，互相鼓劲，也是互相壮胆。

我与其他4 1 4头头一样，心里最惦记的是：4 1 4已经跨出了分裂的一步，团派的激烈反应是必然的。中央会怎么表态？会给新成立的4 1 4总部定什么性？焦虑之中，只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变化。

我们当时的估计是：团派成立革委会的庆祝大会是会如期召开的，所以清华大学革委会也会如期成立的。至于周恩来会不会来参加，不好说，来或不来的可能性都存在，但似乎不太会影响大会的召开。

听到4 1 4总部的成立，团派对这种公然分裂的行径立即给予回击。不过声势不大，因为他们正在专心致志为庆祝大会的筹办做最后冲刺，忙不过来。

当时团派写过一张大字报，我看了以后印象非常深刻。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银基突发领袖狂，前如槐，后万章，骑马挺戈离井冈……”。这首诗写得非常形象、生动，让我马上就联想起高高瘦瘦的堂·吉珂德骑马挺戈大战风车的情景。4 1 4公布的总部委员名单中，沈如槐排在第一名，在我之前，刘万章是第三名，排在我之后。于是，在团派的想象中，沈如槐成了我的马前先锋，刘万章成了我的马后殿军。团派这个战斗组写的大字报颇有文采，只是消息也有点太不灵通了，到这个时候还以为我是4 1 4的一把手，想当领袖而策划了4 1 4分裂呢。

事情的转折没有预兆，来得太突然也太富有戏剧性了。一天后，即5月30日凌晨4点左右，团派广播台紧急广播了谢富治给蒯大富的一封信：“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对你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委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

就像我们今天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我想，全校师生，两派群众，听完第一遍广播以后的反应几乎是一样的：被突发的奇迹惊呆了！惊呆得脑子一片空白！

怎么一回事啊？周总理不来了？革委会推迟了？不成立了？成立不了了？

这封信连着广播了好几遍。之后，接下来的反应，那就天壤之别了。4 1 4 方面锅碗瓢勺齐鸣，口号声欢庆声歌声齐响，毫不掩饰胜利的喜悦。而团派方面则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一片死寂。

我很高兴，很激动，欣喜若狂。因为4 1 4的成立，周恩来不来参加大会，这结果是我们曾经祈望过但又没抱多大希望的。因为周恩来不参加庆祝大会而导致革委会暂时不成立了，这个结局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有一种逃过了大难，躲过了一劫的侥幸感觉。

我马上想到了蒯大富。我想，当他收到谢富治的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的难受、懊丧。革委会的流产，是蒯大富掌权以后最大的一次挫折，也是与4 1 4较量中的严重失败。我想他对4 1 4的怨恨肯定又增加了几分。想到这里，我心里并不轻松。

唉，可怜的蒯大富！

我刚生出点恻隐之心，一想到蒯大富毫不留情地打击唐伟，毫不手软地把4 1 4打成非法组织，我的怨愤又上来了。

哼，可恨的蒯大富！

此时此刻，我对蒯大富的心情真的很复杂。

4 1 4突围意外成功，几乎完胜。团派革委会流产，近乎完败。这样的结局，注定了4 1 4成功之后必然磨难更多，团派失败之后必然复仇更烈。此后，清华出现了一大一小、一强一弱、一朝一野的两个红卫兵组织并存的局面。这团四两派，争斗是常态，偶尔也联合，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直至最后兵戎相见，生死相搏，那种惨烈，在这个5。30的清晨，任谁都没有料想到的。

清华的文革，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 第十五节 4 1 4的一把手是怎么定出来的？我的说法

“4 1 4串联会”的领导机构，是二十几个战斗组长的联席会议，当时称为勤务站。这些战斗组的组长都是勤务员。勤务站按多数勤务员的意见做出的决定，大家都应该执行，一致行动。如果有人持保留意见，不愿意参加某项活动，也悉听尊便，不会追究的。譬如我反对而且没参加4。15强夺广播台的行动，并没有受到勤务站的谴责。串联会的决议并不对所属成员构成刚性的约束力。

此后，由“4 1 4串联会”组织的辩论会或召集的大会上，出头露面最多的除了我以外，还有沈如槐、汲鹏、陈楚三、宿长忠、刘万章等人。那时大家一心想的是如何积聚力量，如何在与总部的辩论中压倒对方，如何抵御总部对4 1 4的高压政策，如何争取更多师生的同情和支持，如何扩大4 1 4队伍。对于经常参加4 1 4活动的普通群众来说，那些常在公众场合亮相的勤务员都是4 1 4的主要负责人。有部分人可能认为我是挑头的，另有部分人可能认为是另一个人挑头的。总之，当时的“4 1 4串联会”是蛟龙群舞但不混乱，大家协商办事，一心谋事，众人齐心，生气勃勃。

就我自己感觉，由于我的名头、影响都比其他的勤务员要大一些，不论是兵团总部方面，还是414群众方面，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414串联会”最主要的头儿。在“414串联会”勤务站会议上，沈如槐经常是最活跃的人物。在整风阶段，沈如槐不仅把“三纵队”串联起来，也把“天安门纵队”与“三纵队”串在一起。开始的时候，他只是穿针引线的角色，慢慢地演变成了会议的召集人，后来又经常是会议的主持人了。在这过程中，他的革命热情，他的协调能力，他的思想观点，逐渐被大家所认可。

无论是“414串联会”刚成立的时候，还是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想过“414串联会”要推举一把手的问题。谁都知道“八八串联会”的头儿是唐伟、陈育延、吴栋等人，唐伟是其中最主要最出名的负责人，是“八八串联会”的代表人物，但唐伟不是“八八串联会”的一把手。唐伟自己也说，“八八串联会”没有定谁是一把手。串联会本来就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没必要设一把手的。我觉得“414串联会”现在这样的协商运作机制已经不错的了。

“天安门纵队”也好，“三七战团”也好，虽然比串联会的组织要严格、固定一点，也没以某种程序确定谁是一把手。一般人都认为我和汲鹏是代表人物，或者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也仅此而已，并不是一把手。我们当时把这些头衔都看得非常轻。你属下的成员认为你是头儿了，那就是头儿了。那个年代，谁都可以自封为“司令”，只要有人愿意跟着你走。一个没有兵的司令，那就是光杆司令、空头司令。要是手下有几个人、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上百人愿意跟着你，你叫“勤务员”也好，叫“司令”也好，都是一样的，你都是他们的头儿。

“天安门纵队”、“三七战团”的实际运作是王允方、高季章他们。我知道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比较弱，顶着主要负责人的虚名已经有点名不副实了。所以，我没想过“414串联会”要有个一把手，更没想过我要去当它的一把手。

我没想，不等于别人就没想。

大概是5月中旬（也可能在上旬或下旬，实在记不清了）的一个晚上，我忙完事情回寝室休息。到了宿舍里，同班的老四问我：“414的一把手是沈如槐吗？我们还以为是你呢。”

我说：“从没明确过谁是一把手呀！你们怎么知道沈如槐是一把手的？”

他们说他们听到414广播台广播了一篇稿子，里面提到沈如槐是414的一把手。

真的？我有点不相信。他们说亲耳听到的，不会有错。

我沉默了几秒钟，一下子就来气儿了。广播台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的乱说的呢？怎么可以没经过“414串联会”勤务站的讨论决定就宣布某某是414的一把手的呢？那也太不像话了吧？

我楞了一会儿，猛地感到一阵被强迫接受的屈辱涌上心头。我觉得连跟我商量都没商量一下就宣布沈如槐是一把手，实在太气人了！

找他们论理去！我一扭身，往外就走。一边走，一边感到十分委屈和憋气。

我一路快步疾走，间或小跑几步，从12号楼奔向大礼堂的方向。下意识中，我好像是要

到科学馆的414广播台去质问一个明白似的。

穿过六、七号楼中间的小广场，经过新航空馆，还没过新水利馆东北角那座小桥，我被从宿舍里赶出来的两个同班老四赶上了。老张老李看到我神色不对头，激动得都失态了，怕我出事，赶紧跑步追上来，终于追上了我。

他们一个从后面用双臂用劲地抱住我，一个在前面挡住了我的去路，嘴上喊着：“老孙，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我正在气头上、火头上，哪里听得进去？我使劲挣扎。他们不放手，把我抱得紧紧的，让我动弹不得。我挣扎了一会儿，没挣开，就僵持在那里。

他们问我，你要干吗去？你找谁去呀？你就是要去找人，也要冷静一点以后再去的呀！

因为不再脑袋既空白又混乱的赶路了，慢慢的，我开始冷静下来了。

是的，我要找谁质问去？我要质问他们什么？我为什么要去质问呢？

我答不上来。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想好，我干吗要跑去质问？我有点泄气了，身子不再硬邦邦的了。趁势，他们把我连拉带推强劝着回到宿舍。他们看着我上床了，又劝慰了几句。

我躺在床上，一直在想刚才自己提的那几个问题。

我问自己：“你想当414的一把手吗？你有能力当414的一把手吗？”这两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的：我不想，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谁能当414的一把手呢？”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

我是要去质问为什么把沈如槐称为414的一把手？我强烈反对沈如槐当一把手？好像也不全是。我老实承认，沈如槐当414的一把手，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但是我并不强烈反对他当一把手。

那么为什么我一听到沈如槐是414一把手这个消息会那么冲动、那么失态呢？我问自己的心。

我的心告诉我，我是因为这件事没有经过协商就强迫我接受的做法所激怒的，是对“东方红战团”这种做派心里感到很愤懑。如果“东方红战团”想拥推沈如槐做414的一把手，完全可以在勤务站会议上正大光明地隆重推出沈如槐作为候选人让大家讨论决定。凭着“东方红战团”的人多势大，要达到这个目的是不难的。那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做派。尽管我或“三七战团”的其他人可能会对414需要不需要明确谁是一把手提出异议，也可能对“东方红战团”推荐的人选提点不同的意见，但是，对我们而言，只要“东方红战团”坚持，这些台面上活跃的“东方红战团”头头，我都可以接受的。

既然我不想当414的一把手，既然“东方红战团”的人那么想让他们的人当414的一把手，既然我并不反对沈如槐当一把手，那就让他们这样做去吧，让沈如槐去当这个一把手吧。

这么一想，虽然反感他们这样做派的气还是没有完全消退，但我决定不再跟他们计较论理

了。心里一释然，也就慢慢入睡了。

第二天，我像没事儿一样，照旧做该做的事。

不知道“三七战团”的其他同志有没有听到这一广播，也不知道4 1 4广播台此后有没有再造这样的舆论，反正我的平时表现与以前无异，大家也与我一样，忙着各自的事情。

当年我失态这件事情，连王允方、汲鹏他们都没有告诉。此后，我也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前些年，老蒯率一帮团派朋友来杭，有人直接问过我：“你们4 1 4当年怎么会推选沈如槐当一把手的？”对他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个不解的谜团。我笑笑，未作解释。

我在前二年翻出了一份在1971年9月所写的交代材料底稿，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在5月29日4 1 4总部成立以前，是“4 1 4串联会”的形式，由一个勤务组负责，共20多人，组织上比较松散。那时沈如槐还不太出名。而我因为本来是兵团总部的核心组成员，而从一月份以来一直与蒯大富有意见分歧的总部内唯一反对派，所以当时影响比沈如槐大。尽管串联会勤务组中从来没有排过谁是第一号头头、（谁）是第二号头头，但当时4 1 4和团派群众的心目中，我是4 1 4串联会的主要负责人。不过我与沈如槐是明确分工的。我负责主持“4 1 4串联会”的大会，沈如槐负责（主持）勤务组会议。实际上“4 1 4串联会”的骨干力量是“东方红”，其次是“三七”，沈如槐也在主持勤务组会议中慢慢形成他的核心和威信。到4 1 4总部成立时，才正式定沈如槐是第一把手。

由此可见，在整个“4 1 4串联会”期间，是勤务站集体领导，并没有明确谁是第一把手或总负责人。后来慢慢地形成主要由我主外、沈如槐主内的领导格局。因为我出头露面比较多，名气比较大，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4 1 4串联会”最主要的头儿。

4 1 4总部成立的时候，协商决定总部委员名单，才明确了沈如槐是4 1 4总部的一把手，排名第一。具体的协商细节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为什么推举沈如槐作为4 1 4的一把手，我猜想是这样几个原因：

1、为了主导4 1 4，“东方红战团”必须要争一把手这个位置。他们早先制造的舆论也是为争一把手做准备。在他们看来，““天安门纵队”是温和派，孙怒涛是代表人物。其他的四个纵队都是强硬派”，沈如槐“是代表人物之一。在4 1 4的发起人，4 1 4的核心组中，强硬派占大多数，他们不希望温和派做一把手。主要是担心温和派在关键时刻有可能把队伍引向妥协之路”。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了，确实是“东方红战团”的心里话。在“4 1 4串联会”成立前后，“天安门纵队”、“三七战团”都是“三纵队”、“东方红战团”团结、争取的对象，是友军，是同盟军，但不是依靠的对象，不是“我军”（“三纵队”之间的关系，才是“我军”之间的关系）。我和汲鹏作为4 1 4的核心成员，可以参与决策，但是绝对不会让我成为4 1 4总部一把手的。假如我硬争，“东方红战团”宁愿另外成立其他的组织，也不愿屈居在不能由他们主导的4 1 4总部里。在整风中，“三纵队”被总部强制解散，后又受到各种压制，这对“三纵队”的刺激很大，让他们吃到了没有权力就要任人摆布的苦头。所以，“东方红战团”对实权看得极重，他们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点意识他们是很清醒、很强烈的。

2、沈如槐在“4 1 4串联会”成立之前及其成立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充分表现出他立场坚定、观点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精力充沛、工作能力强、作风雷厉风行等特点，展示了他的才干，树立了威信。沈如槐自己也说：“最主要的因素则是在前一阶段与蒯大富是斗争中，我的态

度坚决，旗帜鲜明，并在策划成立 4 1 4 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在“东方红战团”中，资历比沈如槐老名气比沈如槐大的还有几位。综合考虑以后（其中有沈如槐是“东方红战团”核心中班次最低，在高班头头毕业以后仍能带领 4 1 4 坚持下去这一因素），他们认为沈如槐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从来不认为沈如槐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私利权欲而争权夺利的人。但是为了“东方红战团”这一群体利益，沈如槐不想做一把手也得做一把手。当然，有“东方红战团”做后盾，沈如槐自信有能力做好一把手。此后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沈如槐做 4 1 4 的一把手是勤勉的、出色的、得到 4 1 4 广大群众拥护的。4 1 4 即使在最内乱的时候也没发生过争夺领导权的内斗，这是 4 1 4 的万幸。

3、我比较温和的观点虽然赢得了大多数 4 1 4 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缺乏一把手的气魄和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出自蒯派，来自团派，曾是兵团总部委员，与蒯大富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这样的政治背景，很难取得“东方红战团”的充分信任。而我在签订《四项协议》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右倾、软弱和妥协，更遭“东方红战团”的恶批，认为我“违背 4 1 4 广大战士意愿，没有坚持原则”。广大 4 1 4 群众也对我大为不满。在 4 1 4 上下的一致炮轰下，我的威信也骤降至最低。在两派尖锐斗争的环境下，呼唤一个更强有力的一把手领导 4 1 4 是必然的选项。多年后蒯大富曾对我说过，4 1 4 如果你当一把手，两派可能早就实现大联合了。此话听起来似乎很有点道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老蒯的假设前提是不成立的，我是不可能成为 4 1 4 一把手的。蒯大富坚持不肯在《四项协议》上增加“正确”两个字，也让他的“如果”更加成为不可能。

4、无论是“东方红战团”还是“三七战团”，我认为头头对个人的权欲名利都不怎么看重，但是对群体的权欲，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三七战团”继承了“天安门纵队”宽容、顾大局、忍让以及书呆子那样的不争权理念。在 4 1 4 里，不仅“东方红战团”的力量明显强于“三七战团”，对团派、对蒯大富的态度，也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抱幻想、态度强硬，表现得更勇敢和坚决。所以由“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出任 4 1 4 总部的一把手，变得顺理成章了。

从此以后，由沈如槐执掌的 4 1 4 大船，开始了外战与内斗的艰苦历程！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 0 1 3 年 2 月第一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